

第一篇

对外开放与开放效率

第一章 开放效率：分析概念与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中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未来的增长无疑取决于更加有效地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和我国国民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和内部环境都在发生着重大的改变，今后我国的对外开放无疑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和更多的机遇，因此，我们不可能也不应当只是沿袭过去比较成功的经验。我们应当确立以改进开放效率为核心的战略指导思想，从整体上要更好地处理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深化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开放效率的分析性定义

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世界各国愈来愈广泛地实行对外开放。开放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高级发展形态，其主要的特点是通过世界范围的市场交换来实现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大大打破了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曾经长期存在的国家或民族界限，带来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历史性变革。开放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发展，同时，它又给市场经济的运行带来了新的机制和特征。在现实生活中，开放经济直观地表现为涉外经济交流十分活跃。比如，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跨国投资等生产要素的国际性流动相当频繁，国际收支对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十分敏感的作用等。然而，开放经济决不仅仅是从对外交往方面来判断，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内部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的安排。区分不同经济的根本标志是其基本的制度安排，开放经济的关键和本质是实

行一种双向交往的经济制度。^①

实行对外开放肯定会为一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也无疑地需要在经济上付出相应的代价。各国经济在开放过程中都是利益与成本共存，机遇与挑战同在。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倒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有效地实行对外开放。后一个问题如果能解决好，相信很少有人会不支持本国政府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然而，目前经济学理论还没有提出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用来衡量或判断一国的对外开放是否有效或者是否合理。我们认为，要给上述问题提供一个答案，提出和建立开放效率的概念非常必要。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实践工作来看，进行这种新的探索都有重大的价值。

显然，我们不能单纯从实行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利益方面来判断开放的效率。同封闭经济相比较，开放经济体系能形成特有的经济开放利益，这主要表现为对外开放会极大地改变一国进行资源配置的市场环境，使本国供给充裕的生产要素得到有效利用，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加速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积累。静态地看，假定资源和技术等条件相同，开放能使公众获得较高的消费福利水平；动态地进行分析，开放可以明显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②然而，一国为获得开放利益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却是不确定的，现实生活中有时虽然利益很大，但代价也相当高昂，足以使对外开放不能实行或无法维持下去。

同样，也不能只是根据开放过程中发生的成本来评价对外开放的成败。实行开放政策要付出经济上的成本，这种开放成本主要来源于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源重组的耗费和较大的外部不确定性。比如说，参与国际分工往往意味着要对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减少甚至放弃某些产品的生产，把生产资源从缺乏比较优势

陈飞翔，开放中的经济发展。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4年，第3页

② 陈飞翔，开放利益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的部门转移出来。而且这种资源的重组并不是一次性的，它往往会贯穿一国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一般地讲，发展中国家往往需要承担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开放成本。但是，成本低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国从对外开放过程中获得的利益就大，成本高也不一定表明实行开放政策所带来的利益就小，二者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判断。

概括地说，要判断一国在经济上的开放程度或某项开放政策是否合理，应当也必须对利益和成本两个方面进行比较，以判断一国的对外开放是否具有效率。所谓开放效率，就是指实行对外开放过程中利益与成本的比较。如果一国实行的开放所带来的利益大于成本，这种开放就是有效率的、合理的；反之，如果开放所带来的利益等于或少于成本，就是没有效率的、不合理的。重视开放效率，也就是要力求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在成本一定的条件下达到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当利益为一定时实现成本的最小化。

确立开放效率的概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实行开放政策可能获得的利益在明显地上升，但同时开放的成本也将显著地提高。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扩大对外开放的压力都在增加，然而，在给定的条件下对外开放的程度和速度如何把握，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开放效率的概念提供一个简单而又实用的判断准则。在许多现实的场合中，正是由于缺乏对开放利益与开放成本的综合比较，没有对开放效率进行合理的分析，片面地加速或者放慢开放进程，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甚至产生相当有害的结果。

开放效率是可以进行定量计算的。比如，要考察政府推出的某项开放政策效率如何，就应当对实施该政策所带来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量进行计算，包括直接和间接的生产价值增量，同时也对该项政策可能造成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损失进行统计，这也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生产价值损失，然后，对二者进行比较来得出结论。以现有的统计手段再辅之以适当地运用投入产业分析等方法，作出

具体的定量分析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过程比较复杂一点。但是，通过定量分析而得到的结论显然要比凭经验作出的判断准确。类似地，要判断一国总的开放程度是否合理，也可以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

当然，对开放效率进行定量分析有时可能需要支付相当高的信息成本。因为利益不同等因素而导致的信息不完全，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不确定性等原因，在某些场合对开放效率进行定量分析是存在很大的困难的。为了分析和应用上的方便，我们在这里先采用定性的方法对开放效率进行直观的判断。具体地讲，可以采用以下两条相对简便的标准来评价一国对外开放的效率：

第一，是否有利于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对外开放是手段不是目的，任何国家实行开放政策的根本追求都是为了加速本国的经济发展。当其他方面的条件相同时，如果扩大开放能够提高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时，这种开放就是有效率的；如果增加市场准入程度等措施导致本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这样的开放就是没有效率的，不合理的。应当看到，对外开放的实质是立足于本国的实力来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竞争，不是乞求也乞求不到别人的恩赐。本国的经济发展受到损害，对外开放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外开放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以损害本国经济发展作为代价。在这个方面，不能也不应当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标准。

第二，是否有利于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愈来愈明显，对外开放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要增强本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因此，一国经济上的开放程度是否适当，是否增加或减少某些方面的开放措施，要充分考虑国际上的反映。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合作，一个国家本身也就谈不上开放问题。比如说，政府对外汇流通的管理措施，可能有利于保持汇率的稳定，避免外汇市场上发生过大的波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外国商人的进出口贸易和投资活动，从而增加本国企业

与外国企业之间的经济交往。能够帮助本国在国际上更多认同的政策和措施，总体上说应当是合理的；反之，如果不能获得国际上的认同，这样的开放通常是没有效率的。

上述两条标准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一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对外部世界就会有更大的吸引力；一国经济越是能保持稳定的增长，就越能为外部提供有利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从而也就能更多地获得国际上的认同。而在一国能获得较多的国际认同时，往往有利于增强外商开展贸易和投资的信心，这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融资成本，增加本国企业出口的机会，从而会有利于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现实生活中一般情况下都应当综合考虑这两条标准，力争实现两者之间的合理协调。从长远考虑，二者应当是一致的；但从短期考虑，二者之间也可能出现矛盾，这样的场合我们倾向于第一条标准优先。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西方有些人主张各国在对外开放中首先要考虑的是扩大国际社会的认同，甚至将它当作唯一的判断标准，其实这是有特定的指向的。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认为如果不说它是别有用心，也至少可以说是不切实际的。

就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而言，有时会面临来自外部的比较大的压力，要求快速地提高经济开放的程度，有时会导致较明显的对保持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不利的局面的出现。这时应当作出的选择就应是坚持以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为标准来规划整个对外开放的进程。基本的理由是，尽管经济全球化的速度日益加快，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但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经济利益主体，目前还没有、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也不会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利益补偿机制，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在对自身利大于弊的前提下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换言之，开放效率总是对各个具体的国家而言的，在可预见到的时期内，还不可能以全球利益为第一标准来判断开放效率。我们不赞成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经济全球化并非自然而然地对所有国家都是利大于弊的。

准确地判断一国对外开放的效率是一个挑战性很强的研究课题。从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展开之初，人们就试图对其进行效益和价值判断。比如，国际贸易的开展‘为什么’和‘怎么样’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利益产生影响，就是古典经济学理论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比较成本理论”。随后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的各个主要流派，都不可避免地要对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进行实证分析和价值判断。其实，这两个方面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实证分析是价值判断的重要依据，而价值判断又往往会对实证分析产生重大的影响。应当说，在关于如何看待一国对外开放这一问题上，实证分析和价值判断更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消费者福利最大化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用以判断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标准，也常常被用来作为判断开放经济问题的标准。比如，西方主流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就是以国民消费福利水平的提高来作为支持开展国际贸易与投资乃至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证据。其基本的推理是，通过国家之间的相互贸易进而实行劳动分工，就有可能在资源总量不增长、生产技术不改变的条件下，使消费者获得比各国自给自足时更多的商品。以此作为基本的出发点，西方经济学家竭力主张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主张努力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举例来讲，通过采取削减关税等措施，可以使消费者剩余增大，因而削减关税等是合理的。类似的分析方法在国际投资等领域也经常使用。简单地说，根据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来进行判断，如果对外开放能够增加消费者剩余就是有效的。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经济学家主张从其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则是比较明显地倾向于采用产业成长的标准来衡量对外开放是否合理。这种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他认为，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特点是片面地重视交换价值而忽视了财富的生产力，一个国家在参与

国际贸易活动时，首先要考虑是否有利于本国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要重要得多。在此基础上，所谓保护新生产业的主张获得了广泛的赞同，甚至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不少人也赞成保护新生产业的论点。以产业成长为标准来判断一国的开放政策是否合理，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中似乎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不过，福利标准也好，产业标准也好，都显然不能真正准确地反映出开放的效率。理由很简单，实行对外开放通常都会增进消费者的福利。其实，只要有商品进口，就意味着一部分消费者能够以支付较低的价格来购买商品，获得的效用增多。但一国在整体上是否获得利益则需要另作判断。比如说，商品进口给国内相关产业带来的损失，可能大于消费者节约的支出。因此，只有当其他方面都没有发生明显损失的情况下，才可以说消费者福利的改善意味着开放是合理的。同样，产业成长标准也有局限性。产业的成长，不管是通过贸易保护还是出口拉动来实现的，应当考虑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多少。通常情况下，依靠贸易保护政策发展起来的产业缺乏效率，往往较长的时期内不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即使是通过出口贸易拉动起来的产业成长，也不一定都能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带动作用。

概括地讲，对开放效率作出合理的判断，需要选择一个适当的角度。这方面应当注意到两点：一是以国家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对外开放的程度是否适当，开放政策是否有效，需要从其对整个宏观经济局面的角度来考虑，不能片面地从消费者福利或某些产业的成长来作出判断。二是要对成本和利益进行比较。现实生活中对外开放总是利益与成本并存，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进行了比较多的分析，只有通过合理的比较才能有正确的判断。

二、开放效率的主要制约因素

至少，从主观愿望出发，各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都希望能不断地提高效率，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然而，由于在此之前没有人明确地提出过开放效率这一理论概念，也就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如何有效地实行开放作出合理的判断。我们在这里是首次构建开放效率这一概念，当然会面临着许多问题需要探讨。作为研究过程的一种起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来看，要对开放效率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判断，首先应当就影响开放效率的主要因素作具体的分析。

现实生活中不难观察到，在不同的国家或在一个国家的不同时点上，开放效率往往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比如，在经济上的开放程度相同时，不同国家通过实施开放而对本国经济发展产生的拉动效应有很大的区别。基本相同的开放政策措施，能够使一些国家经济上获得的利益明显地超出所付出的成本，而却可能使另外一些国家在经济上受到严重的冲击而获利甚微。发展中国家在放松资本项目管制等金融自由化采取的措施，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开放效率的高低同现实的社会经济环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这包括一国内部和外部的经济环境。

开放效率与一国经济上的开放程度和开放速度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所谓开放的程度越高，经济运行的效率越高，越开放越好，只是以发达国家为特例所作出的结论，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相当高，但经济运行的效率并不怎么样。开放不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充分条件，把开放效率与开放程度二者等同起来是根本没有理由的。类似地，认为推进开放的速度越快，开放的效率就越高，就越会有利于促进本国的增长，也只是主观的推测。俄罗斯实行激进式的对外开放政策，实践已经证明效果很不理想。应当说，开放效率本身要求根据具体的

条件和环境来对开放程度和开放速度进行合理的把握。

前已指出，开放效率是一国开放进程利益与成本的比较。因此，从深层次上来分析，开放效率主要取决于从一国通过国际经济活动来获得利益的能力，以及在这种过程中必须要付出代价的可能性。可见，开放效率基本上是由各国本身的内部条件来决定的。至少可以说，一国本身的经济基础是影响开放效率的主要因素。具体地讲，开放效率主要受到本国下列实际因素的制约：

首先，产业的发展基础。一国实行对外开放，经济上的利益来源之一在于利用外部市场来优化资源配置，即将生产要素相对地集中到出口产业部门，进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改善公众的消费福利。在这里，关键是一国要有规模较大的、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部门，同时，出口产业与国内其他产业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效应。否则，一国就难以维持必要的进口，也难以通过开放来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一国根据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还要考虑长远发展的要求。一国的产业基础较好，就有可能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不断地调整产业结构，国内资源重组的成本也会相对的低。可以说，开放效率与本国的产业发展基础成正比。

其次，市场的发育状况。当代的对外开放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正是因为超出国界来进行生产和交换，开放经济得以充分地发挥出市场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因此，一国本身的市场体系发育状况，会对开放效率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如果存在比较成熟的市场体系，不仅意味着资源的配置能达到比较合理的状态，资源重组的成本可能较低，而且也意味着一国能自然地适应国际经济的运行规则，从而较迅速地得到国际市场并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反之，对外开放首先就需要根据国际经济的运行惯例来重构经济生活中的制度安排，这不仅需要付出相当大的经济成本，更需要较长的时间，从而阻碍或延缓一国从开放中可能获得的利益，开放的效率也就相对较低。

再次，企业的竞争能力。实行对外开放带来的显著变化是企

业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一国的企业能否在国际竞争面前得到长足的发展，就直接地影响到一国在开放中可能获得的利益。企业缺乏竞争能力，实行对外开放就会付出相当高的成本。当然，从长远看，开放本身会促使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但在给定的时点上，企业的国际能力对开放效率有明显的制约。在这里，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营销能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代企业的竞争优势，核心的因素是技术创新，实现的途径是市场营销。本国的企业真正形成了竞争优势，一国才能在对外开放中抓住机遇，而不只是消极地面对外部的冲击。

第四，政府的调控水平。实行对外开放涉及到广泛的经济利益关系调整。一方面，开放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重组会导致一国内部的经济利益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某种形式的社会矛盾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实行开放在使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增加的时候，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并不总是协调的，有时矛盾还会相当尖锐。因此，政府是否有能力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直接地影响到一国的开放效率。具体地讲，政府努力保持国民经济相对稳定和国际收支动态平衡的能力是关键性的，是实现有效开放的基础性条件。因为每当国民经济发生波动时，内部的利益矛盾就会相对地突出。如果国际收支出现重大失衡，不仅国家之间会出现利益的摩擦，国内的利益矛盾也常常会因此而激化。稳定和有效率的政府对一国开放效率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当然，外部环境也对一国的开放效率有重要的作用。在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中，一国的对外开放就可能在成本相同的条件下获得更多的利益。外部环境发生重大的变化，可能导致一国在开放过程完全失去原先获得的利益，而维系对外开放的成本陡然增加，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其他国家经济开放带来的冲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不过，相对于外部因素的而言，上述几个方面的内部因素制约作用明显的占了主导地位。这里有两个基本的理由：一是在外部环境相同的条件下，有些国家能在开放过程中有效地促进

本国的经济增长，不断地提高在国际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有些国家的开放效率则很低。可见，内部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二是外部环境是一个国家本身难以控制的，改进开放效率应当也必须从内部着手。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由于内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效率往往会比发达国家低，这是一个短期内难以改变的事实。发展中国家要很好地改进自身的开放效率，也往往需要一个比发达国家长的过程。也正是因为如此，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地注重效率。发展中国家不应当过高地估计自身的实力，也不能过于乐观地估计外部的环境，必须根据本身的客观状况合理地把握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发达国家相同的义务是极为不公平的，当然，这并不否定发展中国家在改进开放效率方面仍然存在广阔的空间。

三、提高我国开放效率的政策选择

开放效率既是一种理论分析概念，更应当是一种行为决策的理念。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以效率为核心，那么，由于市场经济国际化所带来的各国的对外开放，更必须以改进效率作为最根本的理念。效率是竞争的基础，开放意味着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既需要走出去，也有找上门来的竞争，开放过程中不讲究效率就必然会被淘汰。效率是利益的源泉，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没有效率也就不能长期地实现对外开放。在当今时代里，重视开放效率无疑是生存之本、发展之道。

不管世界经济怎样地对外开放，在可以预见到的时期内国家仍然会作为基本的经济单位存在。不同国家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可能获得的利益是不相同的，并需要独立地承担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成本。因此，改进开放效率对各国推进对外开放的进程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是如此。政府在改进开放方面承担着特殊的作用。实践证明，不成功的开放往往是因为政府的决策失误，而有效率的开放总是得益于政府合理的经济政策。这是因为政府的政策不仅对国内不同经济单位在开放进程中的利益和成本有直接的影响，也对开放过程中不同国家之间利益关系有直接的作用。改进开放效率需要并应当从优化政府的政策着手。

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正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历史关头。过去二十余年卓有成效的对外开放，使国民经济的综合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是保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明智的选择。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经济开放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短缺经济时代的过去，标志着经济结构需要进行更为重大的和深刻的调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上升的同时，面临的外部竞争进一步激烈化，面临的外部压力也进一步强化。总体上来判断，中国的对外开放明显地到了边际成本递增阶段。只有努力提高开放效率，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才能持续地、顺利地扩大和深化下去。

努力提高中国对外开放的效率，基本的出发点当然是通过扩大和深化开放来更好地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加快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主流的步伐。显然，这一方面取决于在今后的开放进程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依赖于将扩大开放的成本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力争实现在成本为一定条件下的开放利益最大化。如果说中国过去二十余年的开放政策是相当有成效的，则今后无疑需要努力解决好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以进一步提高开放效率。概括起来说，今后一个时期的对外开放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是：

1. 合理处理扩大开放与适度保护之间的关系，优化市场竞争格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

增加市场准入程度是必然和明智的选择，这有利于改善市场运行的效率。但我国应当重点通过结构优化的方式来削减市场进入的壁垒，逐步改变目前某些产业面临过度竞争、某些产业则存在着竞争不足的格局，为本国产业的结构升级和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1) 以结构调整为主降低总体关税水平

对国内已经成熟尤其是供过于求的产业，原则上应当尽快实行零关税，通过引进竞争来促使国内企业降低生产成本，调整资源配置。关税保护的主要对象应是技术含量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集成电路等，以给国内的相关企业提供成长的时间和空间。进口关税的应税税目要进一步减少，但应当保护的产业就要坚定地给予足够的保护。

(2) 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外商投资领域

在实行国民待遇的基础上，逐步减少直至取消外商投资进入我国劳动密集型过剩产业的优惠鼓励政策，这一措施可以在近期内从沿海地区开始。对外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准入目录应定期进行论证和更新。今后应当制定适当的优惠政策，更好地吸引和鼓励外商投资更多地进入我国需要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

(3) 有步骤地逐步增大人民币汇率弹性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应当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坚持对资本项目进行管制的原则，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则需要进一步扩大，以更好地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汇率的合理化能让本国的比较优势在市场上更好反映出来，有利于加快比较优势模式的转换，有效地发挥出价格杠杆对国内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

2. 正确对待对外开放和走向世界之间的关系，深化国际分工参与度，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开放经济本质特征是双向的交流，核心则是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参与程度和竞争能力。中国的开放前一阶段实际上是以请进

来为重点，有效地深化对外开放则需要把重心转移到走向世界市场，要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更多地看到中国企业家的身影。

(1) 在扩大引进外资的同时鼓励企业开拓海外投资

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关联效应，使国内企业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来，促进了企业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今后需要继续扩大引进外资，以使国内企业更多地参与到国际生产体系中去。另一方面，我国从现在起应当把鼓励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以带动国内企业主动地和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 在大力引进技术的同时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

对外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方面有长足的进步，但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仍然严重不足，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这已经成为一种十分严峻的挑战。今后需要诱导企业优化技术引进的方式。比如，制定必要的政策促使企业把引进的重点从硬件转向软件，鼓励企业参与国际间的技术合作开发研究等，以逐步形成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能力。

(3) 在积极利用外部资源的同时引导企业实现制度移植

实行对外开放，企业较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利用外部资源和国际市场上，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更有战略意义的应当是通过开放来培育和形成现代企业制度。今后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在开放过程中加速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比如，通过引进外资和开展海外投资促进国有企业的改制，引导和规范民营企业的体制与管理方式等，以真正从制度上保障我国企业具备国际竞争力。

3. 理性思考融入国际主流与保持国家独立的关系，强化综合国力，增强对国际经济生活的影响力

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对此需要有冷静的头脑，切不可存在天真幼稚的想法。中国要凭自身的实力来参加国际游戏，并凭自身实力的增长来逐步地改变国际经济生活中不合理的游戏规

则，以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进程。

(1) 对外开放要重点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

开放是手段不是目的，通过对外开放来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关键是要能带动民族工业的成长。民族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主干。民族工业本身也是开放型的，但民族工业的发展要坚持三个标准——资本控股、知识产权和企业品牌。^① 民族工业发展起来了，中国经济才有能力更加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才有可能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大的市场。

(2) 对外承担义务时要多考虑实际承受能力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在近期内面临的外部压力会明显地增大。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发达国家必然会对我国提出最大限度的索取，但同时又力图保持某些限制性条款，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具有代表性。因此，在今后几年加入世贸组织的实际进程中，要坚持渐进式的扩大开放，注意适度保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应当始终把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当作指导开放的根本原则。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人民币汇率至今不下调，经济上付出的代价相当高，我们很难从国际社会中得到实际的补偿，应当考虑在一定时候调整汇率，并尽可能避免在类似的场合中再作出类似的决策。

(3) 从多种角度考虑增强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

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是综合性的竞争，文化因素和国防力量等都能对经济竞争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要重视使用和推广中华文化，比如，尽快研制和坚决使用中文电子信息平台、政府部门带头使用国产中文正版软件如 WPS2000 等。文化传播直接地影响商品的市场销售，我们应当充分地发挥中华文化的作用。同时，我国需要形成强大的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能力，这也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能够顺利和持续地进行下去的必要条件。

^① 陈飞翔，论对外开放与民族工业的发展，财贸经济，1998(2)